

目 录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 我党在广东开展工作的回忆 卢云英(1)
- 回忆在大埔交通站时的战斗生活 卢伟良(12)
- 周恩来同志进入闽西苏区的经过情况 李沛群(22)
- 挺进河东 高 健(31)
-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河源、新丰地区
活动的回忆 李光中(43)
- 回忆一九三一年安徽赤南县四区创办的
列宁小学 梅少卿(49)
- 红四方面军长征片断回忆 黎正祥(54)
- 潮汕铁路创办人华侨张榕轩兄弟 李松庵(61)
- 辛亥前夕华侨在中山香洲开埠经过 郑砺石(81)
- 南洋吧国公堂一斑 梁德冲(91)
- 印尼亚细亚油厂的回忆 余华遇 口述
孟 和 整理(99)
- 陈济棠主粤时期省营业工业概况杂忆 谢英明(110)

广东实业公司经营内幕.....	蓝思干(143)
辛亥后至抗战前的广州细纱业.....	陈国康(151)
解放前广东火柴工业概貌.....	黄福山(160)
解放前新会葵业经营概况.....	关协况(187)
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始末.....	冼子恩(215)
曹锟贿选前后北洋政府财政状况.....	魏元晋(228)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我党在广东开展工作的回忆

云广英

（一）一九三七年以前，广东省恢复组织的经过

中共广东党的组织除海南岛、粤东保持少量活动和闽粤赣边委、湘粤赣边委、闽粤边特委、闽南边委活动之外，全省在白区的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晚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亦称两广省委，设在香港）被破坏后，尤其是一九三四年春夏间在香港九龙塘仅存的党组织被破坏以后，就没有党统一领导的有组织的活动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冬，王均予（王平）同志由上海到广州，才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王均予同志原在上海党中央局发行科工作，党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后，发行科的党支部因故与上级党断了联系，但党支部仍独立坚持活动，王均予同志是由该支部派来广州活动的。到一九三六年初，中央北方局又派孔志成同志来广东，孔又名薛尚实，原在全国总工会北方执行局工作。他在全总北方执行局工作时化名罗根，他这次到广东来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广东党的组织活动，经过他几个月的努力，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大抵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经中央北方局同意成立南方临时工作委

员会（简称南委），孔志成同志任书记。到一九三七年夏南委负责干部有饶彰凤、连贯、阿施、尹林乎同志，在此前后，广州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王均予同志任书记。又成立中共香港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后改组为香港市委），吴有恒同志任书记，这是当时南委下属的两个最主要的组织单位。此外，在潮梅地区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才成立，李碧山同志为书记，中共潮汕工作委员会则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才建立，李平同志为书记。党在组织逐步恢复活动的同时，在广州、香港、潮汕等地也建立了许多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其中在广州有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救亡协会、中国青年突进社，还有秘密的学生联合会、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在汕头和潮梅地区有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学协会、世界语学会、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小学教师救国会和青年抗敌同志会等，都是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和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中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两广（广东和广西）军阀李宗仁、陈济棠等举行“两广事变”，他们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有一天，李克农同志到红大政治部来找我谈话说：“两广发生事变，李宗仁、陈济棠等搞“反蒋抗日”活动，真象还不甚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名义向他们做统战工作，你意见怎样？”我立即回答说：“我服从党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过了三天，李克农同志又来对我说：“中央负责同志今天开会研究你到两广去的工作任务，现在你同我到中央办公厅去。”李克农同志偕我到中央办公厅。到办公厅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同志

均已在座。周恩来同志指示我的工作任务，并且对当前的国内形势作了分析。我与李克农同志离开办公厅时，毛主席同我握手说：“你出去做这工作很好！”又过了几天，我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以后，就离开瓦窑堡，经延安、西安、天津、上海，七月间到达香港。当我到香港时，广东陈济棠已因余汉谋叛变而失败逃离广州。我到达南宁市的第二天找到李宗仁，过三天又找到李济深，当时我化名林秀先，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向他们宣传我们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他们表示愿同我们合作“迫蒋抗日”（事后从多方面调查，了解到他们并不是真正搞“抗日救国”活动，而是企图搞事变来发展两广的军阀势力）。在蒋、桂军斗争和平解决后，李济深先生亲写一封信交我转送毛主席，当时因不便带信，我只好把信熟记下来，回到西安后才默写出来交叶剑英同志转呈毛主席，同时也将我到南方后的经过和情况向叶剑英同志详细汇报。不多久就发生双十二“西安事变”，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力挽狂澜，经过谈判后，达到了“迫蒋抗日”的目的。这是我党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从此大大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猛烈发展。

（二）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从延安派干部到广东来开展抗日工作

正在全国抗日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大抵是一九三七年五月间，李克农同志到抗日大学第一期高级班来找我，谈及要我前往广东进行统战工作，我答应后的第五天，李克农同志偕我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去。我们来到办公厅后，由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指示我的工作任务。过了几天，我就与陈英同志到

香港，先同中共南委书记薛尚实同志取得联系，后由他介绍，我以公开的身份对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先生、民族解放大同盟的陈铭枢和农工民主党的李伯球）和十九路军个别干部以及谭平山先生等进行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他们均表示赞成和拥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央又派张云逸、廖承志、张文彬和林青同志等到香港来。张文彬同志专任地下党的工作，他首先了解广东党的情况和处理好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以后，于一九三八年春在广州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代表香港市委的有吴有恒，代表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系统的有曾生同志，其他代表同志我现在已经记忆不起来了。在这次代表会议中，传达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并正式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省委设立常委由张文彬、梁广、尹林平、薛尚实、饶彰风同志等组成。常委成员的分工是张文彬任书记、梁广任职工委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饶彰风任宣传部部长、薛尚实任组织部部长，张月霞任妇委书记，麦××任青委书记。还有罗范群、曾生、吴有恒和孙康同志为省委委员，据说过后又增补古大存同志为统战部长。这次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南方临时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一致认为南委自建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现在它的任务已经结束，因而决定撤销机构，原南委在广东省内的工作转给广东省委，在外省的组织关系，分别转交给外省。至于在海外的组织关系，在这以前已交给廖承志同志负责的系統了。此时，香港市委书记是吴有恒同志，组织部部长是林李明同志，宣传部部长是周伯明同志。广州市委书记是罗范群同志（王均予同志已于三七年冬调去延安，参加党在陕北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组织部部长是李大林（曾保）同志，宣传部部长吴超群同志。（当时还没有宣布

撤销广州市委，它仍保留着，只是调换了个别干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文彬同志指示我到江西找陈毅、杨尚奎同志，我从香港出发，经广州、南雄到达江西省大庾县，经过一星期时间，找到了他们部队的驻地。陈毅同志因公出发他往，我找到杨尚奎同志，向他传达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他们同中央久失联系，音讯不通，忽然见我到来，大家极为兴奋。我驻在那里两天就告别回香港，向张云逸、张文彬同志汇报，从此他们就得与中央取得联系和指示，有力的推动抗日斗争运动的开展。

（三）在建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前后的工作情况

“七七”事变后，全国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我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执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共同纲领，在敌后地区开展抗日运动，积极对日寇作战，起着抗日救国的先锋和模范作用，并且，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我军英勇善战，不断取得胜利，从而震动中外，使我党的政治影响在国内外人民中不断扩大，同时，提高了全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广东省，由于我党在各抗日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国外华侨、港澳同胞中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大力地宣传我党关于抗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抗日胜利的捷报，得到广大群众热烈的拥护，使全省各地抗日的运动空前的高涨。而当时国民党当局方面，余汉谋派自从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倒台之后，拼命扩展势力，成为广东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的矛盾日渐剧烈起来。余汉谋派手中掌握着七八万的武装部队，省级以下的地方政权亦为他们所掌握，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的势力只掌握省政府和广州

市的政权（李汉魂为省主席，曾养甫为广州市长，追随蒋介石的政学系头子吴铁城也一度当过省长），并且在蒋系掌握的省和广州市的政权中，余汉谋派也插进部份的势力。蒋介石中央系在广东，实际上只掌握有税警团的几千武装，另设立一宪兵司令和宪兵队，此外就是特务组织的活动。因之，在广东余、蒋势力的对比，无疑余派居于绝对优势和统治的地位。余汉谋派久已覬覦独霸广东，蓄意把蒋介石在广东的势力挤出去，自当广东的霸王。为了达到此目的，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段期间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对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态度表面上比较缓和一些，抗战初期被迫放宽些抗日的民主，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力避政治上的孤立，和便于对蒋系势力的争权夺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则利用余、蒋之矛盾，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原则，运用到广东当时的客观实际中来，以利于大力推动抗日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一九三七年冬初，张云逸同志由香港到广州，同国民党广东地方实力派余汉谋等谈判，以说理斗争的方法，向他们提出我们八路军要在广州建立办事处，他们迫于形势，只好答应。于一九三七年冬，张云逸同志偕我到广州来建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并指定我任办事处主任。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还有徐青、余萍、陈英、梁惠萍和陈大姐诸同志。办事处建立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领导下，开展公开统战工作的活动。不多久，张云逸同志奉命调去新四军工作后，由廖承志同志直接领导和指示办事处的工作。我们乘抗日战争高潮的良机，进行如下的工作：

- 1、我们用公开身份，大力对工人、市民、抗日民主党派、

爱国知名人士和进步的知识青年抗日团体等，广泛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2、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所谓“政治犯”。当时在南石头和南雄县两地监狱中，关有我们的同志共三百多名，经过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谈判，无条件的全部释放出来。这些同志出狱后，由省委办训练班进行短时间的训练，分配到各地区，参加抗日革命斗争，这对加强我省抗日战争的力量，起着积极的作用。

3、在抗日统战工作中，经过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将我们琼崖（海南岛）的红军改编为琼崖独立大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红军游击队的造谣诬蔑（他们制造反动舆论用“琼崖红军不愿出来参加抗日斗争”来欺骗群众），从而使海南岛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取得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推动了海南抗日斗争的发展。

4、由于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前线英勇善战，不断打击日寇取得辉煌胜利，从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提高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空前的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则在武汉对“蚁社”和山西省“牺盟”等爱国抗日进步青年群众进行陷害，引起全国各界抗日人民群众的义愤。我们在广州市召开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青年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来声援，廖承志同志亲自与会讲话，严肃揭露和批判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和摧残抗日青年群众的罪行。在举行会议中，混进来进行捣乱破坏会议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当场受到与会代表的严词指责，并把他们赶出会场，使他们反革命的阴谋未能得逞。同时也使国民党顽固派的“抗日亡国论”和对日投降主义的谬论受到有

力的反击。当散会时，大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等口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十月，在日寇占领广州之前几个月的时间中，广大的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和归侨纷纷到办事处来报名，要求到陕北延安去学习和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又恨又怕，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派三个坏蛋在旅馆中设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假冒周总理给他们的信件，伪造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公章，到处招摇撞骗，特别是欺骗拉拢知识青年和学生。我们发觉后，通知广州警备司令部中的进步人士把他们其中一个坏蛋逮捕起来，同时没收他们伪造的信件和公章，由警司审判，判决徒刑，从而又一次给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以沉重的打击。

5、一九三八年“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中，广州市几十万群众举行纪念大会，并游行示威，我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分馆、救亡日报等单位的工作同志和抗日群众团体均参加游行示威活动。郭沫若同志带头领队参加游行，在游行中，沿途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打败日寇，解放全中国！”“拥护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广大抗日群众同声响应。过后，不少群众兴奋地说：“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组织这样庞大的群众集会是没有过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还是第一次！以前谁叫这一口号就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头。”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广州市内几个热闹的市区都搭起抗日献金台，我们办事处同志登台向广大群众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

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不断取得胜利的事迹，并号召抗日爱国群众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我们的宣传和号召得到抗日群众和爱国人士热烈响应，许多人当场捐献了不少现金和药品。与此同时，我党在香港也同样进行了许多工作，得到港澳爱国同胞和国外华侨很大的支援，因而大大扩大我党和我军政治影响。

6、在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期间，由于我党和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政治上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抗日救亡的意志也不断加强，于是广大进步青年工人、学生和爱国归侨同胞纷纷到我们办事处来，诚恳要求到陕北延安去学习和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对此我们办事处表示热烈欢迎，及时地介绍他们到延安学习和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前后计有千余人之多，其中归侨和港澳的工人、青年多是经过连贯同志从香港介绍来的。在抗日高潮中，我们对要求介绍去延安和参加我军的人，条件特别放宽，只要表示拥护我党我军坚决参加抗日斗争，不怕艰难困苦，自备旅费，同时填写一张简单的登记表，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些青年人介绍到武汉、重庆或西安办事处，然后转去延安。这些同志到延安后，受到党的教育培养，成为革命的干部，对加强和壮大我军的力量，开展抗日斗争，起着很好的作用。

（四）广州失陷后八路军办事处的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入侵广东，当时余汉谋是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他手中掌握着七、八万的武装队伍。但是为保持实力，把民族存亡置于不顾，对敌毫无抵抗，

让日寇长驱直入。十月二十二日广州被日寇占领，广大人民至为怨恨。在敌人占领广州之前两天，我同王文杰、陈健同志从广州黄沙站登上国民党军最后撤退的一列火车，开往粤北；在行车的途中，日寇飞机沿途轰炸。到达大坑口时，我和陈健同志下车到翁源县附近暂住下来，王文杰同志仍乘这列车北上。不久，我们迁移到国民党临时省会的韶关。省委部分同志也集中到韶关地区来。我们就在韶关河西安园住着，把广州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在省委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统战工作。曾在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工作的人员有：云广英、陈健、肖力克（肖明）、赖仰高、邱松、李汉、陈英、黄丽荣、张玉声和梁惠珍同志等。一九三九年春在办事处公开设立电台，使省委与各地党委取得联系，特别是同中央的联系更为密切，对开展工作更为有利了。

于一九三九年，中央为着开展对日寇的斗争，派叶挺同志从新四军回广东，向余汉谋进行统战工作，得到余汉谋的赞同，并任命叶挺同志为东江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随后叶挺同志到香港，会晤廖承志同志，并找到中共粤东南特委，协同他在深圳设立了指挥部，将曾生同志领导的游击大队编为指挥部的特务营。正在部署开展工作中，大抵是一个星期后，蒋介石即电余汉谋，令余立即撤销对叶挺同志的任命，于是叶挺同志又回去新四军工作。

这时中央指示廖承志、连贯同志常住香港，与“南洋救乡总会”联系，动员该会捐款和物资支援东江游击队（曾生大队，王作尧大队）。另动员广大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回国参加东江游击队。同时，还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等参加抗战活动。

中央为了加强地方对日抗战的力量，由中央派来干部，分配到各地抗日游击队中去。卢伟良、梁钧同志到东江，庄田、李振亚

同志等到海南；谢立全、谢斌同志到珠江。同时，由廖承志同志负责解决了东江、海南岛地区的电台问题，取得同各方的联系，使我省的抗日救亡运动更为顺利的开展。

以上是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原则，以壮大和发展我们党力量的具体措施，对广东党和党领导下的武装的建立和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始终实行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阴谋，妄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和消灭抗日进步势力，以利他们对日妥协投降。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正在他们准备实行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我们办事处接中央指令撤退。当准备撤退时，我们办事处发出紧急通知，揭露和批判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对日妥协投降的反革命罪行，并将这通知分发给各抗日民主党派、抗日群众团体，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各机关。不久我们就结束公开活动的工作，我则经桂林办事处回延安，其他同志则由省委分配转入地下进行抗日活动。

一九七九年春于广州

回忆在大埔交通站的战斗生活

卢伟良

一、大埔交通站的建立和活动

一九三〇年，革命形势很好，苏区不断巩固扩大。为了适应扩大苏区工作的需要，经党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学习和白区工作的同志，纷纷到中央苏区去。到苏区工作的同志，经港、粤去的不少。除了中央交通站护送外，为了保证这些同志顺利安全经过白区到达苏区，闽西特委决定建立大埔秘密交通站，特委书记邓发同志指定我担任大埔交通站站长。

闽西特委在永定县虎岗。交通站的任务是负责从青溪——大埔城——潮安——汕头——香港——上海和从青溪——多宝坑——伯公坳——铁坑——桃坑——永定苏区的交通护送任务。我深刻地意识到完成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为了安全护送同志们到达中央苏区，首先选定了黄华、江如良、熊志明、张超、赖义、张俊贤等同志为往上海至香港的交通员。（黄华——即小黄华，广东大埔人。黄华、江如良两同志以后由中央交通站吴德峰站长分配工作。）在青溪到永定苏区则由杨雄、杨芳、阎火星、丘辉如、蔡端、邹春仁、郑启彬等同志为短途交通员。根据工作需要，沿途

设立交通点，如埔北秘密交通点，多宝坑邹日祥同志的家，和青溪永丰余晋伯小店等，以后又扩大到沙岗头渡头面上余均平的一间破屋作为最主要的出入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秘密交通网线。

交通站的护送方法是：水路上用小船护送，旱路上用武装护送。余均平等交通员有小木船一、二艘，我们便利用青溪到大埔城的水路，经常叫余均平把小船开到大埔城河边，听到远方有电船响声来了，小船就靠近电船边去，这样，交通员就很自然地把从上海、香港来的干部从电船接到小船上。到青溪大约三十华里的水路，几小时就到达了，既保护了干部的安全，又减少了干部的疲劳。由青溪到永定苏区一段旱路，我们则由六、七名武装交通员护送。为了方便和掩护的需要，我们布置了孙世阶同志在大埔城靠近河边向埔北道路的地方，开设了一间饮食店，以便干部到达埔城后能吃到饭。

当时革命形势很好，有利条件很多。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形势，机警灵活地进行工作，从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二年春，先后护送了几百名同志通过敌人统治区。记得名字的同志有：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夫妇、刘少奇、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左权、肖劲光、朱瑞、李富春、李克农、胡底、钱壮飞、聂荣臻、张爱萍、胡耀邦、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六如、王观澜、杨尚昆、李伯钊、刘英、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伍修权、张经武、冯文彬、李一氓、危拱之、郭化若、程子华、贾拓夫、廖似光、凯丰、张如心、严重、蔡树藩、陈友梅、乐少华、贺昌、伍永甫、黄甦、吴亮平、李卓然、成仿吾、曾希圣、曾三、刘少文、王秉章、欧阳钦夫妇、张然和夫妇、刘伯坚夫妇、贺诚夫妇、梁广……等。（另一说：王稼祥、陆定一、李一氓、廖似光、凯丰等同志是于一九三三年才进入中央苏区的——编者注。）

交通员的工作是艰巨、光荣的，生活是艰苦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我们十多位交通员中，有七、八位经常往返上海、香港。中央交通站的肖桂昌、曾昌明等同志也经常带负责同志来苏区。我们每位交通员一个月来回二、三次之多。我们认识到交通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带负责同志到苏区去是光荣艰巨的任务。所以人人工作兢兢业业，干劲很足，不论在船上、车上，或到了香港、上海，住旅店时，都注意交通联络地点。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带负责同志在车上、船上，只能说是一同坐船坐车的，互不认识。

在青溪担任短途武装护送的四、五位同志，一夜时间要经多宝坑、伯公坳、铁坑、桃坑到永定苏区，所行的是很少人行的树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十分难行，不论天晴或下雨，有月亮或无月亮，天气炎热或寒冷，为了使负责同志安全到达苏区，到青溪吃了晚饭后，就要“马不停蹄”的开始行路。在路上，我们的交通员象军队一样行动，负责尖兵的同志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行至山林里，经常遇见山猪、黄獐，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的同志从未开枪打过。我们的交通员对工作毫无厌倦的心思，也从未讲过价钱，对党的事业表现了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这里需要提出的有杨雄、邹春仁、郑启彬、余均平、余川生、余维、孙世阶、黄华、江如良等同志，都是我们交通站很好的同志。孙世阶同志是大埔人，在大埔城开饮食店，为了方便来往干部吃饭住宿，后被敌人发觉逮捕，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黄华同志（原名丘延林）是大埔坪沙人，十四岁在坪沙小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七月参加打死国民党反动军官参谋丘文、廖武的行动，表现了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以后在埔北一带工作，后选为交通员，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

征中在国家保卫局工作，不幸在川西北英勇战斗牺牲了。江如良同志到达陕北后也英勇牺牲了。

我们交通站的工作，在党中央负责同志的重视关怀下，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发、肖向荣同志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掩护帮助下，全体同志团结战斗，出色地工作，在经济上做到精打细算，但出于工作需要，沿途的费用稍微宽一点，使每个同志打扮得真象个商人一样。因而，几年来，从未发生过问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二年春我的工作调动了，大埔交通站工作由副站长杨雄同志负责，我到长汀后，叶剑英同志来信要我到瑞金中央局那里谈问题，当时正是春寒的天气，大雪纷飞，寒风凛烈，手冻脚寒，一个人从长汀到瑞金，一路走的甚为艰难，到了瑞金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住了几天，见到了叶剑英同志和一些熟悉的经过交通站的同志，谈论间，知道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后，瑞金作为苏区的根据地，已经把几十个县联成一片了。广大人民群众分了田地，许多地主武装民团彻底消灭了，人民真正的成为主人了。心里十分高兴。

这次要我到瑞金，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听到一些人的反映，说大埔交通站同志在带干部进入苏区时，有个别同志贪心，要了干部棉被和衣服等物质，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说：站交通员十多位，我不知道有这种情况，作为我是交通站站长，对交通员贪心的行为不了解，说明我思想教育抓得不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军优良传统，没有很好执行。但是据我了解，交通站的同志没有那一位有棉被的，我们冬天和群众一块睡眠，从来没有买过棉被，毛毯是有的，因为到香港、上海的交通员带有毯子去的。衣服也只有几套，但是有几个交通员家在永定苏